

一百年前的「文學興國夢」

◎ 劉緒義

學文學的都知道，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文學史上曾經豎起過一面「文學救國」的旗幟，影響很大，雖然事過境遷，然而，回味起來也頗有意思。因此，當我在一家書店見到這本名曰《文學興國策》的小書時，眼睛一亮，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等到打開看時，方知「上當」。

這本薄薄的只有七萬餘字的小書，是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於2002年1月出版的，「近代文獻叢刊」之一種。可是這本書的來頭卻有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前，也就是1896年由上海廣學會初版至今，這是第一次再版。而最早介紹翻譯出版的卻是一位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 , 1836-1907）與一個名叫任廷旭的光緒進士。

書名為《文學興國策》，其實講的並不是文學。此「文學」是「文化教育」的舊譯，書中的「文學部」則是美國教育部的舊譯。因此，確切的書名應該是「教育興國策」。至於「文化教育」緣何在一百年前被譯成「文學」，大概是出於當時還沒有「文化教育」一詞；而「文學」一詞則始於孔子《論語·先進》，孔門四科之一，指的就是文章學問；另外，古今中外也曾把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統稱為文學。近代意義上的文學則專指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出現較晚。因此，這裏的「文學興國」與後來的「文學救國」完全是兩回事了。也可見譯者考慮到了十九世紀中國人的接受程度，書中不少的詞語也完全是為了切合當時中國的實際。

這本書就這樣把我帶回到了一百年前，一百年前的中國、美國和日本。

森有禮（1847-1889），便是這本書的編者（始作俑者），他出生於日本鹿兒島一個薩摩藩武士家庭，早年留學英國，1870-1873年間出使美國，1875年擔任駐大清國大使，是近代日本第一任文部大臣。1872年2月，他在華盛頓日本使館內以個人的名義向當時的美國政界、學界發出一批「外交函件」，諮詢「教育興國」之道。在這篇〈日本駐美國京城護理公使森有禮公函〉中，稱：「尚奉特旨，訪察一切凡有益於敝國文學諸事，並講求一切凡有關於敝國振興諸端。……以作為東方開化之助。」秉承這兩個「一切凡有」的精神，森氏特別開列了五個細目：「富國策，商務，農務與製造，倫常、德行、身家，律例與國政。」並且預先就準備「刊印成書，上呈有司，下示人民」。這五端可謂囊括了教育對社會人生的種種效用在內。看來，這封信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美國各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不少有識之士紛紛覆函，各抒己見，精明的美國人不願意錯過這一次向東方灌輸美國文明的好機會。這些人中包括耶魯大學校長華爾賽（Theodore P . Wooleey ,1801-1889）、安漢斯德大學校長施瑞恩（William A .Stearns ,1805-1876）、威廉斯大學校長郝普經（Mark Hopkins , 1802-1887）、哈佛大學校長歐理德（Charles W . Eliot ,1834-1926）、哲學家和教育家西列（Julius H. seeIye ,1824-1895）和麥高希（James McIosh , 1811-1894）、政治家鮑德威（時任美國教育部長，George S . Boutwell , 1818-1905）和加非德（Jams Abram

Garfield , 1831-1881) 、著名物理學家恩利約瑟 (Jeseph Henry , 1797-1878) 、數學和天文學家滿勒 (David Murray , 1830-1908) 、傳教士潘林溪 (Octuavius Perinchief , 1829-1877) 和腦德祿 (B. G. Northrop , 1821-1898) 等知名人士。光這個名單就不同凡響。《文學興國策》就是由這13位人士的覆函編成的。此書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視，「仔細研究，擇要實施」，其貢獻之大，不必細述。

這本書傳入中國，還是由於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戰，在此戰的刺激之下，變法圖強、文學興國的聲浪「驟然高漲」，中國上上下下都開始了戰敗後的反思。作為傳教士的林樂知，便抓住這一時機，將《文學興國策》中的思想以及日本的實例向中國知識界介紹推廣。不出林之所料，此書一出，知識界嘩然，一時間「新學」的呼聲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戊戌變法中的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羅振玉等人的聲音了。民國初年，知識界再一次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教育救國」運動思潮，也可見此書的影響了。鄒振環把它列入《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實不為過。

這本足以反映百年前中國的「文學興國夢」的書，在今天仍可作為一段珍貴的史實來讀。由於書是完全用信函寫成的，而且又不同於同時代的科舉試策，信的作者又是名流，各自的觀點不受任何拘束，因此，我們還能讀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思想、旨趣。例如：同樣是大學校長，耶魯大學校長華爾賽與安漢斯德大學校長施瑞恩則截然不同，前者寬宏，他提出「蓋人既讀書，即能日辟其新知。既有所知，即欲得而用之」的思想；後者則純粹，希望「引基督清潔之教道」，滿紙「基督」。而哈佛大學校長歐理德則更簡約，提出「當別求一種文字」，「教學之法，貴有良師」。

過去人們大多以為那段時期中國的教育多學習日本、德國，從這本書中我們不難知道，其實質是美國出思想，日本出實例。這本書雖然已成為昨日黃花，但細讀之，我們仍可發現它的現實價值，有不少地方不啻為針對當代中國教育所發。

在這些美國知識界人士心中，森有禮所開列的五條細目，無疑也切中了他們當時所思所想，可以說是當時國際教育的大勢。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必說，但具體到五端，各人又同中趨異，其中仍可看出其思想之火花。如彼得哥伯在論及商務一端時，提出「萬國通商至要之端，在於各國先自謀其生財之道，先自盡其致富之方。凡人能自立而無求於人，即所謂富矣」，這在今世全球化大潮中亦值得發展中國家一思了。而在論及美國教學之成法時，不少人提到了「義務教育」。義務教育雖始於二百五十餘年前的普魯士，法定每個公民自七歲開始享受九年的義務（強制性）基礎教育，這為普魯士最終在「滑鐵盧戰役」中戰勝拿破侖奠定了基礎。美國作為「拿來主義」典範，它在汲取歐洲的義務教育經驗上走得更遠，在腦德祿的信裏面，說及美國各邦興學之情形，「幾於無處無學塾，無人非學生矣」，且其經費，「為數甚巨，或由紳富之願捐，或由民人之遺贈，或由公家變賣官地」，彼得哥伯還創立了哥伯工藝院，「凡屬工人，皆得不費分文，入院肄習各項制造之法」，另設讀書房（相當於圖書館），「無須憑照」，另請人講解。「查美國捐助文學之官地，按照管理官地署中之簿籍，自始迄今，共捐助至四兆八億頃之多，合並計算，約得十二萬五千方里，幾可與歐洲小國爭衡矣。」（《美國興學成法》）相當於江浙三省之面積。在學校設置上，「教導聾啞人之院，尤比盲人院為更多」，也是美國一大特色。此外，還值得一提的便是，美國知識界對農務的重視，幾乎是一致的，「農務為各國事業之首，以其為生民粒食之源，及制造各物料之所從出」（華爾賽語），就連身為資本家的彼得哥伯亦不輕視農業，威廉斯大學校長更明言「一國之致富，皆成於農功、制造之中」、「物產之豐歉視文學之深淺以為量也」。彼時美國，「舉古時一切耕種、收穫、磨礱之器具，無不以新式之機器代之，所以人工日

省，無復若昔年奴僕之苦」。

美國的教育思想與日本的實例無疑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知識界中隱約勾劃出一幅美麗的藍圖，但這個美好的「文學興國夢」卻最終成了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日本自明治初年開始頒布《日本國民教育法》，實施近代世界各先進國家的「強制普及義務教育」制度，大幅提升教育經費，在全國城鄉普遍廣設學校、課堂，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辦學，強制普及全國學童免費義務教育；強化成人教育；開辦職業培訓；派出大量留學生；引進外國科技、教育人才；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內，趕上歐洲一兩百年的近代發展歷程，全面提升了其基本國民素質。中國雖然早日本十年左右開始興辦「洋務」，但其時的國中，流弊尤大。首先在於那根深蒂固的「儒家傳統」。中國不像日本，日本畢竟是「誤承儒學」，要放棄別人的東西容易，而中國要放棄自己的寶貝就難了。就連李鴻章也在中日議和之際對日本首相伊藤大倒苦水：「閣下在貴國所興之事，大著功效，鄙人亦久願在敝國仿效之，惜一言新學，即有言不能盡之難處，如閣下設身以處鄙人之地位，當亦知其甚難矣。」李氏仿佛已經預見到了兩年後「六君子」人頭落地那血淋淋的場景。由此也可見，一種單一的文化教育對思想鉗制的威力。其次是對農業農民的忽視。70年代始清政府公費派出大量留學生，學習西方科技文化，到了80年代很多人已學成回國服務。從1885年開始晚清不但還清了全部外債，還出現財政盈餘，到1894年止每年高達400萬兩，可見辦義務教育不是沒有錢，雖然康有為在維新變法之前即提出過振興中國長治久安三法：第一「富國之法」：一曰鈔法；二曰鐵路；三曰機器輪舟；四曰開礦；五曰鑄銀；六曰郵政。第二「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二曰勸工；三曰惠商；四曰恤貧。第三「教民之法」：一曰普及教育(強制普及國民義務教育)，「凡七歲學童，皆必入學，逃學中綴，加罪父母」；二曰改革科舉；三曰開設報館；四曰設立道學。但是實際上毫無實行的可能。1907年著名學者張謇(光緒狀元)也曾詳細考查日本，考察的結果是在其《東游日記》中所寫：「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這與森有禮的「首為富國，次為商務，次為農工」迥異其趣。此時的中國知識界也許還沒有精力考慮農民問題，特別是農民的教育問題。我們也聽不到農民的聲音。中國農民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手工耕作至今仍然大量存在，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仍然成為政府的一大難題。義務教育在中國實施時間不長，在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的同時也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口號教育」和「下有對策」正使廣大知識界人士有了種教育危機，科教興農，特別與農民結合起來的義務教育仍然任重道遠。

「臨睨太平洋，淚眼望神州」。康有為這位中國近代變法第一人，乃至近代知識界文學興國夢的破滅，離我們尚不遙遠。這冊記載著近代東方屈辱與奮起的《文學興國策》的再版，也許有益於我們記住歷史、記住我們祖先的夢。

劉緒義 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管理系講師，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 2002年12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2002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

